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名著系列

权力流散

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

[英] 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著
肖宏宇 耿协峰 译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权力流散

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

[英] 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著
肖宏宇 耿协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4-05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英)斯特兰奇著;肖宏宇,耿协峰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名著系列)

ISBN 7-301-09526-0

I.权… II.①斯… ②肖… ③耿… III.权力-研究 IV.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3576 号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By Susan Strang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书 名: 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

著作责任者: [英] 苏珊·斯特兰奇 著 肖宏宇 耿协峰 译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526-0/D·127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75 印张 211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正毅 王逸舟 王缉思 许振洲

宋新宁 张睿壮 时殷弘 庞中英

金灿荣 倪世雄 秦亚青 袁明

贾庆国 阎学通 楚树龙 潘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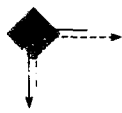
出版者言

我们一直在呼吁建设独立自主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但在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学科交叉如此频繁和复杂,实现国际关系学学科的完全自主似乎已成为不可能。但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依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为了推动这项事业,我们采取原版影印的方式,组织引进了一批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领域颇有影响的国外(主要是美国)教科书,也就是我们已经出版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原版影印丛书》。在推出那套影印丛书的同时,我们还选择了一批最有影响的学术经典著作,推出了一个影印版的《学术精品系列》,与原版教科书共同构成了一个原文教学和科研的参考大系。

如今,我们在这个大系的基础上,再推出一个翻译版的大系,即现在的这个《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目前我们把这个译丛分成两个子系列:一是《经典教材系列》,一是《学术名著系列》。

《经典教材系列》着力引进国外著名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的大学教科书,按照其侧重点的不同,分别涉及世界政治(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外交政策等等,以期对我国现行的高校教科书体系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同时也起到对照和激励的作用。因此,我们在选择国外教科书时奉行的宗旨是:服务于我国高校的教学和学科建设,向广大大学生和更多读者提供最具亲和力的专业读物。当然,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所倡导的态度始终是“拿来主义”的,绝对不主张照搬照抄国外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国外教科书有其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注重基础、亲和力强的特点,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但也有一些弱点,比如主要针对的是其本国的大学生,而且往往带着发达国家的政治“有色镜”,这些都值得我们在阅读和使用加以分辨。

《学术名著系列》则重点选择本专业领域内的名家代表作,侧重学术性、专业性,但不唯流派、不倡门户之见,坚持开放性和多元化的原则,让国内的学术界了解到国外国际关系学术界“百花齐放”的特征,从中感受魅力、体悟精华、掘采灵气,以期对我国的国际关系学术发展起到启迪思维、放宽视野、见贤思齐的效应。因此,我们在选书时既优选长盛不衰的大师经典,也青睐学术新秀的最新开拓;



既聚焦于声名远播的方家文墨，也不拒绝学界“孺子牛”的真心书写；既热衷于那些坚守学科自主的佳作，也投好于那些跨越学科篱墙而独树一帜的名品。当然，学术的限度永远存在。学术著作应该是开启智慧的钥匙，而不应该是束缚思维的绳索，我们引进国外学术名著的意旨和诚界也在于此，故亦请读者明辨。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尤其是其基础部分，更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这项系统工程的一小部分，希望有更多的教员和学生以至于更多的出版界同仁参与到我们的这项工作中来，共同把我国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这门学科推到世界水平上，不仅在世界上创出更多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学术成果，而且搭建一个供各国学界同仁交流的学术舞台。

希望我们的呼吁和努力一如蓝天鸽哨，长久地留响于读者诸君的心际！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3月1日



译 序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伟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已故英国著名学者,是20世纪“一位伟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①。她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奠基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不到40年的短暂历史上,斯特兰奇被称为是最杰出的三位西方学者之一。另外两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美国人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加拿大人考克斯(Robert Cox)。^②

斯特兰奇逝世后,她的亲密同事和朋友,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全球化和地区化研究中心(CSGR)主任、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海根特(Richard Higgott)和威尔士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University of Aberystwyth, 威尔士最高学府)国际关系学教授图泽(Roger Tooze)合写了悼念文章。该文把斯特兰奇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著名作者和发言者。这两位英国著名学者还指出,斯特兰奇的著作和个性在学界和政界都有回应。即使那些不同意她观点的人,也承认她思想的独创性。^③

^① Palan, Ronen, “Susan Strange 1923—1998: A Grea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6, No. 2, pp. 121—132.

^② Robert O'Brien and Marc William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Evolution and Dynam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25—32.

^③ Richard Higgott and Roger Tooze, “Susan Strange Obituar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isation Newsletter*, Issue 2, 1998, p. 4.

1923年6月9日,斯特兰奇诞生于英格兰多塞特(Dorset)的一个海军上校家庭。1943年她于伦敦经济学院(因战争当时位于剑桥)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加入英国新闻界,最初是在《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担任编辑部助理,后来作为英国《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记者常驻美国华盛顿和纽约,躲过欧洲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工作到1949年。返回英国后,1964年前,斯特兰奇继续担任《观察家报》的记者和作者,同时,她在伦敦大学院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讲授国际关系。1965年,她转到与英国外交部关系密切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担任研究员,主持“跨国关系研究项目”。这成为她学术生涯的起点。在她的努力下,该研究项目取得了成功。正是在“查塔姆大厦”(Chatham House,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另一个称呼),她的第一本著作《英镑和英国政策:从政治学角度对一种衰落的国际货币的研究》(*Sterling and British Policy*, 1971)问世。1970年,她发表了后来影响了几代国际关系学者的论文《国际关系学和国际经济学:相互忽视的典型》。^①该文是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1974年,她与著名学者巴肯(Alistair Buchan)一起创立了英国国际研究协会(BISA)。今天的英国国际研究协会,拥有上千名职业会员,不仅是英国,而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研究团体。斯特兰奇曾讲过,她从未设想过要当教授。^②可是,1978年,年过半百的斯特兰奇却接受了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蒙塔古·伯顿(Montague Burton)讲席教授(即系主任)职位。她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10年,为英国和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和教育立下汗马功劳。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大学教授。

她几乎是当代事业大器晚成的楷模。回到研究机构和大学时已经人到中年,而她的一系列代表作的出版几乎都发表在她的晚年。1986年,她出版了《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③,1988年出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国家与市场》。^④1989年,她到意大利佛罗伦萨担任欧洲大学院(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首席教授。在那里的四年中,她出版了与工商学教授斯托普福特(John Stopford)合作的获奖著作《竞

① Susan Stran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46 (2) 1970.

② 转引自 Robert O'Brien and Marc William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Evolution and Dynamics*, p. 27.

③ 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④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Competition for World Market Shares*)。1994年,斯特兰奇应邀开始担任华威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退休后教授”职位(post-retirement professorship),主要给研究生上课。在她的领导下,华威大学建立起英国规模和影响都最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项目。不仅如此,华威大学全球化和地区化研究中心的建立和发展也与她的努力分不开。她一手创办了该中心,并把这个中心当作是她生命最后的知识之家。^①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欧洲最大、具有世界影响的全球化和地区化研究机构。

斯特兰奇的学术成就不断得到世界各地的注意、承认和表彰。从伦敦经济学院和华威大学等英国著名大学毕业的她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其中许多人都成为国际研究学界,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她的著作不断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外文而广为流传。她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明尼苏达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米兰大学和东京大学等的访问教授。让她的学生和朋友值得自豪的是,1995年,斯特兰奇当选为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的国际问题研究组织——美国国际研究协会(AISA)的主席。这是美国国际研究协会成立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非美国人主席。

斯特兰奇不仅是伟大的学者,而且是伟大的母亲。她有过两次婚姻,家庭幸福,生育了六个可爱、优秀的孩子。在她逝世前两周,与癌魔顽强搏斗的她,在病床前看到了《赌场资本主义》(Blackwells, 1986)的姊妹篇《疯狂的金钱》(*Mad Mone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的出版。^②1998年10月25日,斯特兰奇75年奇特而不凡的知识生涯终结了。

独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体系

斯特兰奇一生治学严谨、勤奋、敏锐、著作等身,构筑起来一个博大精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体系,所以,简单地概括她的学术特点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① Richard Higgott and Roger Tooze, "Susan Strange Obituar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isation Newsletter*, Issue 2, 1998, p.6.

^② 《疯狂的金钱》之所以是《赌场资本主义》的姊妹篇,是因为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一个新版本。

• “非正统的现实主义者”(an unorthodox realist)。^①毫无疑问,斯特兰奇是现实主义者,在她的著述中,人们很容易找到权力政治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想。她一生都在观察和研究权力。然而,她没有把国家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密切关注在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变化中权力的变化。她不断地建议她的学生,在观察全球经济时,要思考一系列“谁”之类的政治学问题,例如“谁受益”(Who benefits)、“谁获得什么”(Who gets what)、“谁行使权力”(Who exercises the power)。斯特兰奇十分关注世界经济中发生的变化。她认为,由于市场、公司和技术革新,国家运行的环境不断变化。而正是这些变化改变权力的分布,影响国家对权力的行使。

• 斯特兰奇的研究充满了批评精神,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学术挑战者(包括挑战她自己)。她一向不人云亦云。在与一些美国学者的争论中,斯特兰奇反对美国学者研究所谓“规制”(regime)问题。^②早在1982年,她就认为,对规制的研究是错误的。1987年,当一些美国学者提出“美国霸权衰落”论调时,她则反驳说,美国霸权衰落的理由是不成立的。1996年,她认为,由于全球化,国家的权威正处在深刻的转变之中。

• 斯特兰奇一直在发现为普通人们“忽视”(neglect)的重要现象、问题和方面。她最早指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只关心国家权力、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的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的学者是片面性极大的学者,而国际经济学家则往往忽视了权力等政治问题。这就是她提出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相互忽视”。“如果国际政治仅指不同于其他政治学的一项研究,只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只把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视为关注的主要问题领域,我对国际政治的特殊兴趣也就没有了。”^③除了发现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相互忽视外,她不断地指出其他大的、长期受到的“忽视”。例如,她一再表扬她的好朋友、美国现实主义大家吉尔平(Robert Gilpin)最早重视国际货币体制(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对世界政治的“革命性”影响。“在国际关系或者甚至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几乎没有人承认或者研究这种革命。”从1986年吉尔平出版《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到斯特兰奇去世的1998年,长达12年,像聋子一样,吉尔平

① Robert O'Brien and Marc William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Evolution and Dynamics*, p. 27.

② Suzan Strange, "Cave! Hic Dragones: 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International Regimes), Spring 1982, pp. 480—481.

③ 见本书第6页。

在美国的学生和同事充耳不闻他的观点。^①斯特兰奇在她生前最后一篇论文中详细说明了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忽视”^②。

• 她始终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作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市场和权威之间关系的学问。斯特兰奇通过解析世界经济的基本结构来认识世界。在《国家与市场》一书中,斯特兰奇指出,除了关系性权力(A迫使B按照A的意志行为),权力还存在于结构之中。结构性权力是在特定领域形成游戏规则的能力。确定游戏规则的人是决定过程和结果的人。她认为世界经济中存在着安全、生产、金融、知识主体结构(key structures)和一些诸如交通、贸易、能源和福利的附属结构(secondary structures)。“世界政治、社会和经济中的结构性权力这一观念的提出,为的是要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国际关系学中所谓的现实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③

• 重视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者(即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者)严重忽视或者轻视非国家行为体。斯特兰奇正好相反。她是现实主义者,却没有像其他现实主义者那样沉迷在国家中心范式中。她是国际关系学界研究非国家行为体的先驱。在去世前的20世纪90年代,斯特兰奇的主要精力放在非国家行为体上。在前面提到《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1991)一书中,她指出,传统的外交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活动,但今天的外交却包括了国家与公司、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互动。外交的含义已经不同于以往。斯特兰奇的不少著作,包括本书,对跨国性质的工商团体、官僚,甚至秘密犯罪团伙等在削弱国家的权威中的作用进行了一般性的研究。

• 金融和信用是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她认为,对信用的生产和控制是在全球经济中权力的重要源泉。她研究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原因,认为金融全球化符合最具有权力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利益。不过,她担心,缺少适当管制的金融流动可使世界金融体系转变为“赌场资本主义”,质疑失去政府控制的自由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1998年,在观察了先后发生在拉美、亚洲、俄罗斯等地严重的金融危机后,她表达

① Susan Strange, "What Theory? The Theory in *Mad Money*", *CSGR Working Papers*, University of Warwick, No. 18, 1998.

② Suzan Strange, "Cave! Hic Dragones: 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International Regimes), Spring 1982, pp. 480—481. 这是斯特兰奇生前最后的著作。

③ 见本书第2页。

了这样的看法：广泛的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终结。^①

• 尖锐批评产生在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斯特兰奇号召英国学者和学生提出不同于美国学者的问题，并运用不同于美国同行的方法论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使得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了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作为一位英国和欧洲学者，她没有被“政治科学”禁锢的美国版国际关系学所左右。正因如此，反而赢得许多美国学者的敬重。因为她的努力、贡献和影响，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很大的差异，成为当今世界两种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②

代表作《权力流散》

这是一本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非国家权威”的权威著作。权力的分布、结构和转移是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十分感兴趣的问题。斯特兰奇也不例外。她认为，国家权力（权威）正在衰落，而非国家权威却正在兴起。权力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大转移。她认为，权威从弱国向强国转移，这些强国的影响超出其边界之外达于全球或地区；权力由国家向市场进而向非国家权威转移。

本书是斯特兰奇的代表作，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该书与1988年出版的《国家与市场》、1991年出版的《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两书构成斯特兰奇著作中的“三部曲”。中文译者把该书翻译为《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传神地把握了该书的精神实质。原书书名中的“The Retreat of the State”也可以通俗理解为“国家退居二线”，即国家权力的减少，或者翻译为“国家的无能”。

“政治的范围要比政治家们所做的更广大，权力可以由政府行使，也可以由非国家权威行使。”^③ 在过去，国家垄断了一切权威，而现在，权威不再由国家一个行为体掌握。非国家行为体普遍地介入各种世界经济的主体结构和次级结构中。它们影响着世界经济过程的结果。斯特兰奇指出，从表

^① Susan Strange, “What Theory? The Theory in Mad Money”, *CSGR Working Paper*, No. 10, 1998.

^② 参见 Craig N. Murphy and Douglas R. Nels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3), 2001, pp. 393—412.

^③ 见本书第5页。

面上看,由于国家对其居民的日常生活干预很多,人们产生了国家保有其权力的印象。一些国家(如美国)比另一些国家更有权力。其实,一系列的非国家行为体已经和正在挑战国家的权力,包括那些最强大国家的权力。斯特兰奇在本书前言中指出:“许多国家的权力已经更加严重地衰落了,以至于它们对其人民的权威和它们在其疆界之内的行动已经弱化。与此同时,非国家权威却已越来越多地影响其人民,并越来越深地渗入到他们的活动中。本书试图用实例来解释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并通过理论分析来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①

《权力流散》一书试图摆脱国家中心主义(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羁绊,打破片面的社会科学(例如“结构现实主义”)的藩篱,试图寻求“谁或什么对变革负责”和“谁或什么行使权力——改变结果及改变他人选择的权力”两个“谁”问题的答案。全书分为理论和实证分析两部分。前一部分描绘了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另一种可选择的研究方法或路线的研究草图,在技术、市场和政治三个层次上回答问题;后一部分则根据经验实例,提供了从新的、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方向上进行研究探索的坐标。

重视和研究斯特兰奇

斯特兰奇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她用自己的理论体系推动了社会科学的进步。不研究斯特兰奇,人们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知识将是极不健全的。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斯特兰奇的著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尽管她的著作终究也是一家之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研究者越来越重视斯特兰奇的著述。截至目前,我们至少可看到她的代表作的两三个有了中译本。当然,这一译介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肖宏宇博士和耿协峰博士通力合作,出色地把《权力流散》一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为斯特兰奇著作的中文出版立了功。我相信,该书将一定有助于中文读者更好地了解斯特兰奇晚年的复杂思想。

中国还没有召开过关于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的专题讨论会,没有一本系统研究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的专著。借《权力流散》中文出版之际,我期盼,今后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和学生能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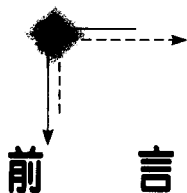
^① 见本书第3页。



强对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深入研究,有兴趣和有条件的国际关系学研究生可以此为题从不同的角度做几篇博士论文。

庞中英

2005年8月12日于北京寒舍



本书的下述假设并无多大新意：国家的疆土界线不再与经济和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威的范围和界限相吻合。在先前的一本反传统的教科书《国家与市场》(States and Markets)中，我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框架，用来分析基于四个基本结构的世界上“谁获得什么”的问题。在那些结构中，凌驾于人和凌驾于体系中各种价值观的混合体之上的权力，是由那些提供安全或威胁安全的人所行使，由那些提供信用或阻碍信用获得的人所行使，由那些控制着知识与信息获取的人以及那些厘定知识性质的人所行使。此外，在生产结构中，权力的行使针对的是生产什么、在何处生产以及由谁按什么条件生产。所有这些权力结构都越过了那些显示在地图上常常是武断地划分一个国家权威与另一个国家权威的疆土界线。当然，保证我们安全的“某些”结构性权力仍然处于这些界线之内，由我们所在国家的政治权威行使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结构性权力仅只由国家权威来提供，也不是只有国家权威威胁着所有的结构性安全。在国际政治经济的金融结构中，这一点更加真实。一家英国银行的一位年轻交易员在新加坡通过缺少监督的套利行为就能够把巴林银行(Barings)给搞垮。无独有偶，一个在纽约为大和证券(Daiwa)工作的日本人能够在短时间内造成超过10亿美元的损失，致使该机构的美国分部关门大吉。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主要中央银行之间已就金融合作达成了管制框架，但存在于其间的漏洞，似乎使得私人金融操作者能够超越任意一家央行的控制而自主行事。

至于知识结构和生产结构，领土国家早已丧失了它们一度拥有的在其疆界之内对商品和服务产出的控制权，以及对知识和信息的创造、储存与交

II

流的控制权。

这一简单的框架从根本上对所有那些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思路构成了挑战,那些思路集中关注的仍然是政府之间就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汇率和银行监管、外资等进行的讨价还价活动。对这些旧思路而言,政治经济学中的修饰词“政治”只是与国家的政策有关系,而与世界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和政策无关。对社会学家们而言,结构的思路更易于接受,而且它也为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发展——他更早提出过一个颇为呆板的词语,“构成”(structuration)(Giddens, 1979, 1985)。结构的思路在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作品中也有体现(Cox, 1987)。世界政治、社会和经济中的结构性权力这一观念的提出,为的是要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国际关系学中所谓的现实主义传统中解放出来。《国家与市场》一书的错误之处在其书名上。它模糊了书中通过描述和分析四种结构性权力而明确阐明了的要点,即国家仅仅在其中一种权力结构——安全结构——中扮演主角,甚至在那里它也经常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在所有其他三种权力结构中,非国家权威对于决定“谁获得什么”起着非常之大的作用。《市场与权威》(*Markets and Authorities*)才是一个更恰当的书名。

因此,现在的这项研究其实是对有关权力与作为当今世界之特色的跨国关系的上述类似思想的一项扩充,或者是一种澄清。这些思想的形成实际上甚至早于《国家与市场》。它们源出于我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持的研究计划。那是一个有关跨国关系的项目,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为期3年。我的同事有马赛罗·德西科(Marcello de Cecco)和路易斯·特纳(Louis Turner)。前者就国际货币与金融提出了一些新想法,显然为节省文字,他将这些想法写成尚待完善的文章发表在《国际事务》杂志上^①。后者则对当时的热门领域——世界石油业——展开研究,而且出了一本书^②。我则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综合性的也有点算是理论性的,另一篇是专门性的也是经验研究的^③。我现在把后一篇看做是本

① M. De Cecc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U. S. Domestic Policy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ly 1976.

② L. Turner, *Oil Compan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llen and Unwin for RIIA, 1978.

③ S. Strang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ho Runs World Shipp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ly 1976.

书的先驱。因为它确认了一系列行使着结构性权力的非国家权威，它们决定着海洋贸易中的各项安排，包括海洋贸易的实施、监管和付费。该文展示了风险与机会、成本与收益是如何在那些跨国海洋贸易事业的参与者中间分担的，他们既包括发货人又包括海运企业，既包括普通船员又包括海运监管人。不仅在这些人之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展开了国际保险贸易，同时也出现了海运公司卡特尔，以形成一个海运联合会（对这两者的详细分析，请见本书第9章和第10章）。

自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开展跨国关系研究项目以来，二十年过去了，依我看，许多国家的权力已经更加严重地衰落了，以至于它们对其人民的权威和它们在其疆界之内的行动已经弱化。与此同时，非国家权威却已越来越多地影响其人民，并越来越深地渗入到他们的活动中。本书试图用实例来解释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并通过理论分析来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个前提，即国家（显然不包括美国）的权威这些年来已经衰落了。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干预比起19世纪90年代来，明显地更大些。法律和各种行政法规如今规范着工作的时间、工作场所与居所的安全条件、公民们出门在外的行为。学校和大学受制于由教育部门做出的越来越多的决定。哪怕是最小的修筑活动在开始前都不得不咨询计划官员们，甚至砍掉一棵树也得这样做。政府检查大员——曾经是一个罕见（有时滑稽）的来访者——已经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甚至可怕的形象。所有这些政府干预没有一项是没有代价的。政府日益增加的干预反映在国家从经济、从人们日常工作（农业、制造业、商业或服务业）中所抽取的剩余价值上。这表现在由政府提前支取的GDP份额上。政府的岁入现在达到了国民收入的60%，而曾经这一数字几乎不到现在的一半。“改革”如今总是意味着削减政府活动的开支、缩编官僚机构和鼓励政府部门勤俭节约。而在我们的印象中，过去它的含义却正相反：运用政府权威迫使商业和私人部门普遍实施更为人道和规范性的行为。

那么，怎么可能去宣布政府在退却、国家的权威于其领土边界之内在衰落呢？答案（主要在第5章中）与大多数领土国家的政府所行使权威的数量无关，而是与那种权威的质量有关。依据是，大多数政府没能履行那些非常基本的功能，而它们是国家作为一种制度被创立的理由，比如：维护国内的法律与秩序，防止领土遭到外来入侵者的毁坏，保证提供经济发展的充实资金，确保在买者与卖者、借者与贷者、地主与佃户之间进行基本的产权交易